

城市文化丛书

最憶是杭州

周维强

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周维强
著

最憶是杭州

最忆是杭州

目 录

文明的普及化和教育的多样化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笔下的南宋杭州「教育生活场景」…………… 〇〇一

一九二二年春天的画卷

——芥川龙之介写西湖…………… 〇〇八

在新的和旧的之间

——青木正儿说西湖…………… 〇一四

「杭州大学之天然环境」和「西湖的危机」

——陶行知先生致浙人的两封公开信…………… 〇二二

「西泠片羽」

——谢国桢记游西湖…………… 〇二八

落花水面皆文章

——在陈从周先生散文里的西湖风景…………… 〇三五

「旧时月色」

——流在近世文化人散文里的西溪…………… 〇四三

横笛吹云何处起

——现存最早的西湖十景诗…………… 〇四九

坐对西湖把酒樽

——老店名联…………… 〇五二

留与西湖作画屏

——九里松的故事…………… 〇五六

和尚家风三碗茶

——径山茶宴

〇五九

精微仍当吟诗看

——食府新语

〇六四

『度德量力而识时务』

——钱镠与唐末五代杭州及吴越国的治理

〇六七

最爱湖东行不足 绿杨阴里白沙堤

——白居易在杭州

〇七六

平生山林意

——赵孟頫与美丽杭州的文艺因缘

〇八五

却看明月似寻常

——为政平恕高克恭

〇九三

『看了这壁，觑了那壁，纵有丹青下不得笔』

——关汉卿与杭州的文化因缘

〇九八

纵有微风吹不乱 青山织在浪花中

——杨维桢与《西湖竹枝词》

一〇五

对一种精致生活的追忆

——张岱在湖上的幸福往事

一一二

满堂花醉三千客 一剑霜寒四十州

——『民国奇人』张静江在杭州

一二二

『但得西溪秋雪，常在蒹葭深处……』

——读近世儒商周庆云撰著《西溪秋雪庵志》

一三七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李叔同在西湖的出家

休休有容马一浮

大学与人

——竺可桢先生在杭州的几次演讲

逝水人生

——从两部日记看徐志摩在杭州的踪迹

『湖上的华时』

——俞平伯与杭州的文学文化因缘

『我用残损的手掌……』

——『雨巷诗人』戴望舒抗战片段

今宵听雨兼听风 如在西湖山馆里

——青年钟敬文在杭州的民俗学活动

植物园·闲适·人性

吴山意境

走过北山路

青山湖

龙须峡谷

林泉高致

秋天·江南·文人

从蒋梦麟先生的一段话谈起

后 记

一四六

一五六

一六四

一七五

一八八

一九九

二〇六

二一六

二一九

二二一

二二三

二二五

二二七

二二九

二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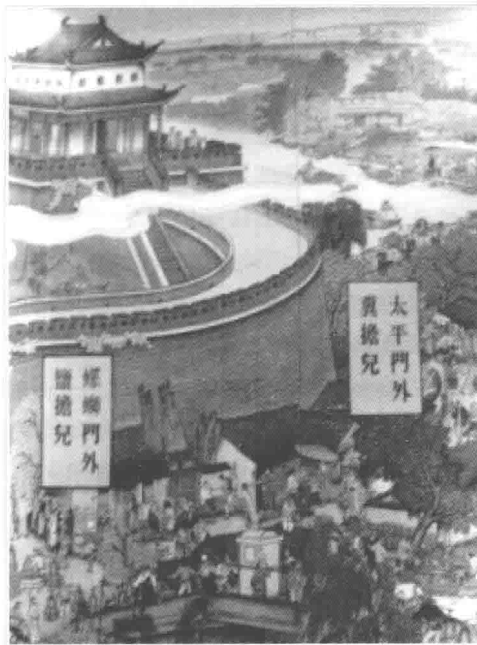
二三六

最忆是杭州

文明的普及化和教育的多样化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笔下的南宋杭州「教育生活场景」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是一部十分有趣的书。书的作者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这部书的《导言》里写道：



我所选定来描绘中国生活的特定历史时期,是被称之为南宋的那个王朝的末年(1227—1279),即其国都从1276年起陷入蒙古人之手以前的数十年。我所选定的区域则为杭州地区,尤以杭州城本身为主,当时这个大都市称作临安,是中国建都之处……在1275年前后,它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为富庶的大都会。

谢和耐以中文文献——包括宋代以来的笔记小说、地方志等——作为基本的依据,描述了南宋杭州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如这部书的章节名称所表明的:“城市”、“社会”、“衣·食·住”、“生命周期”、“四时节令与天地万象”、“消闲时光”等等。谢和耐借助古代书面材料而勾画了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书影

南宋杭州的社会生活——它们的整体景象和细节,并作出了一个生活于西方在西方文化中生长起来的人文学者的思考。

譬如对当时杭州的“教育生活场景”的描摹,就饶有兴趣。

在书的第四章“生命周期”的第三节“抚养与教育”,谢和耐一开头就给出了一个总的概貌:

中国的孩子被教养得和气、文雅和恭顺。他们被教导得把自我克制看成最高的品德,同时必须学会乐天知命,并与亲戚、朋友和外人和睦相处。礼法除此之外并无其他目的,它甚至已经传播到了下层百姓之中。这种礼法反映了某种对人生的理解,并且自有其动人的魅力。这是因为,合乎礼法的彬彬举止并非单纯外在形式,它还伴随着和唤醒着其表达的感情,——在它成为唯一准许的表达感情方式时尤其如此。由此,待人接物的规范就教导孩子们从中兴发出尊长敬贤的感情。他们受到这样的教诲:在聆听父母训诫时不得还嘴;在长者(包括父母及其朋友和其他长辈)仍然站立时不得就座;在长辈劝饮时不得推托不喝。在从中亚发现的晚唐时期的文献中,有些教化德行的课本就包括了这类训诫。孝子、挚友和节妇乃是摆在年轻人面前的人格理想,那些人在孝敬和忠信方面表现了登峰造极的英雄主义。

这一大段的文字,或许表明了古代中

国教育的以德为先的特色,而“德育”的核心内容就是礼,构成礼的主要内容的两翼则是忠和孝。

谢和耐以一个生长于西方文明中的

法国人,很显然地对这样的教育是持有所保留的态度,所以他接下来就说:

这种教养的方式窒息了个性,并且倾

向于塑造出顺应社会的刻板人格类型。这

很难培养出叛逆精神和个人野心,也不易

鼓励出好斗的个性和尚武的精神。

谢和耐又引用了古代的文献,追根溯

源:“据记载,体育运动到13世纪已经不

大受提倡了。实际上,从唐代开始身体锻

炼就开始走下坡路,尽管当时的上流社会

还对从伊朗传入的马球投以极度的热情。

无论如何,在13世纪,只有军队才演练拳

击、角力、击剑、马球、射箭和蹴鞠了。宋代

时期,在寻常百姓所喜爱的锻炼身体技能

的游戏项目和为文人士大夫所喜爱的贵

族化的游戏(棋类、书法和文学)之间,恰

成强烈反差。为军事用途而进行技艺训

练的情况已很罕见,且不受欢迎。这就导

致了应召入伍者大多属于文盲和农民。”

在作出这样的总体的描述和概评之

后,谢和耐的笔触就伸向了当时杭州的更

具体更细微的“教育生活场景”。

谢和耐从他所见到的中国古代文献

里,推断出当时的杭州人“孩提时代是人

生最幸福的阶段之一”——“孩子们获准

成群结队地在街头巷尾尽情嬉戏。他们从

不被责打,即使对付实在太淘气的孩子,

也只不过是借妖怪之类的东西吓唬他们

罢了。”换句话说,严格的礼教,在那个时

候的杭州,是还没有施加到孩子们的身上

的。他们的童年充满了快乐和自由。谢和

耐还说:“我们只要看一看走街串巷卖糖

果和玩具的小贩为数甚众,便可想见当时

的孩子们一定是更经常地受娇惯,而不是

受惩戒。”“孩子们大约到了七岁左右,他们

会被送入学堂,接受教育。富裕人家则会

为孩子延聘家庭教师。

在南宋杭州或中国古代社会里的一

种主流的“基础教育”,可能还是为科举而

准备的“基础教育”;

城市生活的发展、中产阶级的成长,

也许还有印刷术的传播(从公元10世纪

起就有两种印刷版本的经书),均有助于

推动中国东南城镇之公共教育和私人教

育的繁荣。这自然而然地会增加参加官方

科举考试的考生数量,而通过这种考试,

官僚机构吸收了新的成员,统治阶层也获

得了新鲜血液。

在官本位的社会里,如果中举人升进

士而进入官僚阶层可以带来更多的益处,

则科举教育必有深厚的土壤,为科举而准

备的“基础教育”也必定繁荣,所以“杭州

城内有不少小规模学校,其教师为致仕

官吏或科场失意者,他们靠学生家长缴纳

的束脩过活”。这是私学,教师可以靠学费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则可知这类私学的广有“市场”。而“政府”也为满足贵族和高官的子弟之外的社会公众的子弟的读书需求,杭州城便兴办了一家府学和两家县学,“均开设在官衙的围墙之内”。

正如谢和耐所说的,“初级教育完成以后,所有的课程均朝着一个方向设计:把学生塑造成适应官方科场的考生”。学生们于是“终日沉浸在这些古代经典之中,变得不仅能谙熟其中的思想与情感,而且能熟练地掌握表达这些思想情感的方式……进一步说,机械式的训练被赋予了极度的重要性;一位优秀的学生须在心中牢牢记住主要的经典著作,并能充分掌握古代和近代诗人的作品,可以仿照他们的风格写诗”。

这样的教育模式里教育出来的学生,通过科举而进入“各级政府”,能够经世致用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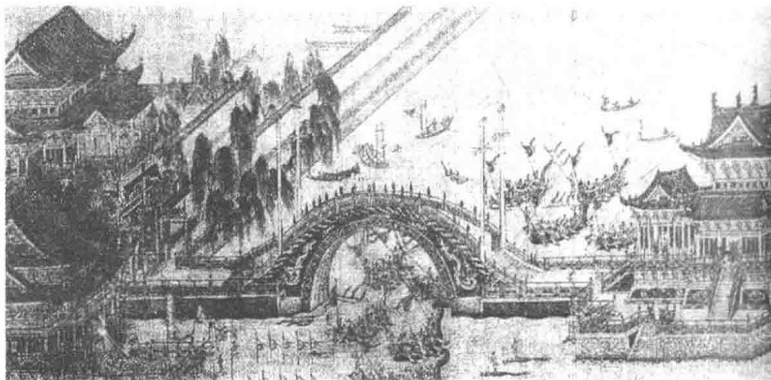
很多人早就表示过疑问:“有宋一代,许多有识之士对于教育形式的艺术性质深为忧虑,认为这种办法只

能教育出审美家和业余的文艺爱好者,而并不具备任何实际的知识——质言之,人们并未为其在行政系统中的预定角色做好准备。”著名的譬如北宋“拗相公”王安石,谢和耐在书里写道——

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他曾经创办过州学和县学)曾于1071年上书痛陈当时的开科取士制度的谬误和阙失。他宣称,这种制度之所以得以创立,完全是因为科场提供了晋身官场的唯一正常途径。可是,究竟还有什么能比强迫精力充沛的青年人关在书斋里以其全部时间和活力去吟诗作赋更荒唐的呢?教育必须为政治哲学和实际行政能力提供更多的空间。

王安石的批评未始没有道理,但是在南宋的杭州,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在总体上恐怕已呈多样化的格局。为科举而准备的“基础教育”依旧是主流,但其他形式的基础教育也是存在的。正如谢和耐所表述

的:“到了12世纪初叶,实际问题无疑已不再像原先那样受到忽视。”譬如——商业的繁荣,杭州成



南宋都城临安的端午节

为大都会,这使一个人接受基本的文化教育成为必须。所以在那个时代的杭州,谢和耐写道:“也许会有大量孩子受到某种形式的基础教育,也就是说,他们被教会粗通文墨,以及如何使用广泛用于计算的算盘。”因为将来到社会上去谋生或立足,用得着这些。这也表明,在杭州一般老百姓那里,教育有没有用,他们是可以从生活实践中自发地得出结论的。但他们的认识恐怕也仅止于此,离开活生生的生活的体验和实践,就未必能将其认识再往更高一个层次提升了。再进一步说,教育的方式和内容要想为公众所接受和认可,其前提必是教育的意义和功效能够为一般公众的生活实践所能验证。教育的理想和激情固然可贵,可若不能被公众认可,又如何能够推行开去呢?一般百姓的实用性的价值判断诚然有其“短视”的一面,但这因讲求“实用”而带来的“短视”,是不是多少也能避免“乌托邦”所可能带来的高成本无收益的风险呢?未成年人为今后能够在社会上立身处世而预先打一些底子所进行的学习,可以叫作基础教育。所以基础教育也就必须与它所对应的社会相适合。“大量孩子……被教会粗通文墨,以及如何使用广泛用于计算的算盘。”——我想,这就是立足于南宋杭州商业文明的有别于为科举作准备的“基础教育”之外的另样的“某种形式的基础教育”吧。

“教育也并非总是纯然文学性和书卷气的。进士科当然是最为人向往的,它考的是韵文和散文,而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并为高中者打开了一条辉煌的仕途。不过,此外还有更专门化和更技术性的考试科目,如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开元礼、三史、学究、明法等,不必说还有武学和医学了。”谢和耐讲述道。专科教育不始于宋,唐代就有了。但正如谢和耐所说的,到南宋,实际问题在教育中不再受到忽视。

在谢和耐的这部著作里,我们看到,南宋杭州的教育,在科举教育的主流旁侧,也还并存着其他形式的教育的支流。或者说,谢和耐的著作给我们勾画了南宋时代杭州城里文明普及化和教育多样化的生动场景。假如有所谓的“南宋遗风”,这个“文明普及化和教育多样化”的传统,不是很有意味的么?

2005年8月29日的《钱江晚报》上刊发了一条标题为《杭州欲为“南宋遗风”正名》的消息——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杭州的人文精神在精致和谐之外,总是留有“南宋遗风”的影子。多年以来,人们总是将杭州人注重享受、追求安逸的生活态度追究到“南宋遗风”身上,且多持批判态度,而学界对于宋代历史的研究也多只集中于北宋。现在有一批学者准备重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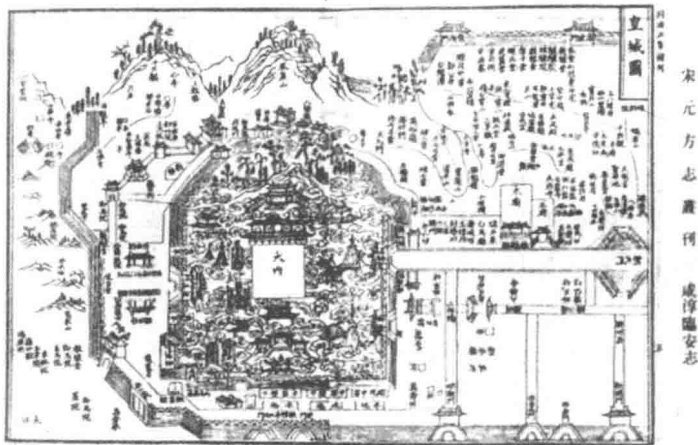
南宋史,50卷本大型南宋史学研究丛书于日前正式启动。

《南宋史研究丛书》由杭州市社会科学院、杭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持编纂,邀请了一批国内外在南宋史研究领域内一流水平的专家学者,开展南宋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内的研究,立体挖掘“南宋遗风”。该丛书包括了《南宋史研究论文集》2卷、《南宋史专题研究》20卷、《南宋人物研究》10卷、《南宋都城临安研究》10卷、《南宋史全书》8卷。其中,“南宋史专题”(上、下卷)将在今年年底出版,其余48卷将在6年内陆续出版。

这是杭州近年继《西湖丛书》之后,又一套集政府和学界之力修订的大型文史类丛书,是杭州市又一项重大文化工程。

有关人士表示,杭州曾经作为南宋的都城,时间长达近一个半世纪之久,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城市建设、衣食住行、风俗习惯,乃至性格、方言等方面,都对后来杭州的发展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但“南宋遗风”对当今杭州人文精神的形成,究竟有哪些影响,学界未有系统的研究;民间对南宋的影响也多停留在“偏安”文化的负面印象上。重修南宋史,旨在全面挖掘“南宋遗风”中的优秀文化传统,寻找适于当下和谐杭州建设的传统文化遗产。

“南宋遗风”究竟有哪些内容?对今天还有哪些影响?这个研究肯定是有意义的。然而研究还没有整体上的展开,标志性的成果也还没有出现,就已经可以“以论带史”地说要“为‘南宋遗风’正名”,就可以匡定丛书的卷数和出版的时间,这或



《咸淳临安志》皇城图

许也表明了今日杭州的人文社会科学界里存在着浮夸风和行政化的积弊吧,这是不是也可以叫作“杭儿风”呢?——这是不是也算“南宋遗风”之一呢?

如果谢和耐这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著作里描绘的南宋杭州“文明普及化和教育多样化”的场景内容属实的话,或许值得我们作更深入和更开阔的考察。或许这个南宋杭州“文明普及化和教育多样化”的场景,是可以列为替“南宋遗风”正名的一个题目的吧?

据说写出皇皇巨著《历史研究》的英国大历史学家汤因比讲过这样的话:要是允许他自由投胎,他最愿意生活的时空区间,当是九世纪(唐代)中国的新疆北部。而写了《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令他最为沉醉的则是七百多年前南宋的临江城,“他有滋味地细细描绘杭州城的百姓生活,堪称文字的清明上河图”(刘爽《到哪个朝代活一次》,1999年6月11日《中国青年报》)。

谢和耐(Jacques Gernet),法国著名汉学家,1921年12月22日生于当时法国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1942年之前在阿尔及利亚完成其学业,获得了古典文学(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和语言学)的学士学位和高等教育文凭。1942年,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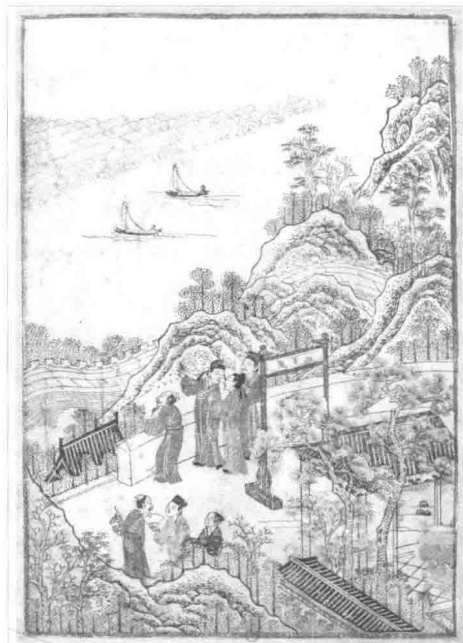
军在北非登陆,谢和耐应召入伍,参加了抵抗德国法西斯及其同盟的正义战争。1945年退伍后,他便将精力转向中国研究。1952年底完成学位论文《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法国是欧洲的汉学重镇。谢和耐则是继马伯乐之后出任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教授的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的高足。戴密微,生于1894年,卒于1979年。戴氏很早就注意到了敦煌文献中的禅宗写本,他曾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的王重民先生一同研讨过敦煌卷子中有关汉地和印度僧人在土蕃争论顿渐问题的材料。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已由刘东译作汉语,江苏人民出版社列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1995年6月出版。我的这篇短文的引文均采自刘东的这个译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子今曾撰写《“豆瓣酱”与“洗澡狂”——翻译的故事与文化》(2001年8月24日《中华读书报》),对刘东这部译著的若干译文瑕疵(主要涉及中国古文献的回译问题)作了纠误,可参看。这部译著第62页的脚注,译者误将莫里哀名剧《贵人迷》(又译《醉心贵族的小市民》)写成《最新贵族的小市民》,则真不知所云了。

最忆是杭州

一九二一年春天的画卷

——芥川龙之介写西湖

芥川龙之介是现代日本产生世界影响的文学家，有『鬼才』之称。1892年生于东京，1927年7月24日，在家中服安眠药自杀。



芥川龙之介的小说,1923年经鲁迅翻译传播进入中国,《罗生门》和《鼻子》是鲁迅最先翻译的,原载由周作人选编的《现代日本小说集》,1923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芥川龙之介作品进入中国的前两年,芥川龙之介本人就已旅行了中国。1921年,芥川龙之介以大阪每日新闻社记者的身份来中国考察旅行,先后游览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回国后发表《上海游记》、《江南游记》和《长江游记》等散文作品。《江南游记》中有专节写杭州西湖。

芥川龙之介用他的文学的笔,留下了1921年春天,或者说是20世纪20年代初的西湖的景象。芥川龙之介不是单纯地写生和记录,他还表达了对当时西湖以及西湖人物的感受,读来饶有意味。

这篇《江南游记》的第六节,就写到了俞楼:

俞楼就是俞曲园的别墅。规模的确大方,即使作为正式住宅也不坏。据说因缘于东坡故居遗址而建,伴坡亭后边的竹子或沿阶的草长得十分茂盛。一个长着许多水藻的古池,使人心情更加闲寂。登上池畔的高处一看,可见曲曲廊的尽头,镶在墙上的石刻。那是彭玉麟为曲园画的梅花图。它就是东京本乡区曙町谷崎润一郎氏故居二楼挂的那张令人拍案叫绝的梅花图原物。按曲曲廊上小轩的匾额来看,这

小轩名碧霞西舍。看完它之后,我们再次来到山下伴坡亭。亭的墙上挂满了俞曲园、朱晦庵、何绍基、岳飞等人的各种石刻拓片。拓片太多反倒不能确定喜欢哪个了。墙的正面庄重地挂着镶在镜框里的俞曲园的长髯照片,人物服饰十分得体。这家主人送来一碗茶,我喝着茶端详俞曲园的形貌。

写到这里,芥川龙之介把笔宕开来,引录章炳麟的《俞先生传》:“杂流亦时时至门下,此其所短也。”然后芥川龙之介又议论道:

如此说来也多少沾些俗气。也许俞曲园正因为有些俗气,才有给他建造如此别墅的十分出色的弟子们。

芥川龙之介的这个话,也正合中国古语说的“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之意。芥川龙之介说这话的80多年后,柯平在《潜园传奇》(载《阴阳脸——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生态考察》,柯平著,东方出版社2004年8月版),也接着说道:俞曲园虽然“研经讲学,著作等身,素为江南士林所仰重……实际生活中走的好像还是袁子才的路子”。柯平甚至还从俞曲园致陆心源的私人书信里,发现俞曲园有向陆心源“公然”“敲竹杠”的迹象。这或许也可印证芥川龙之介的“多少沾些俗气”的议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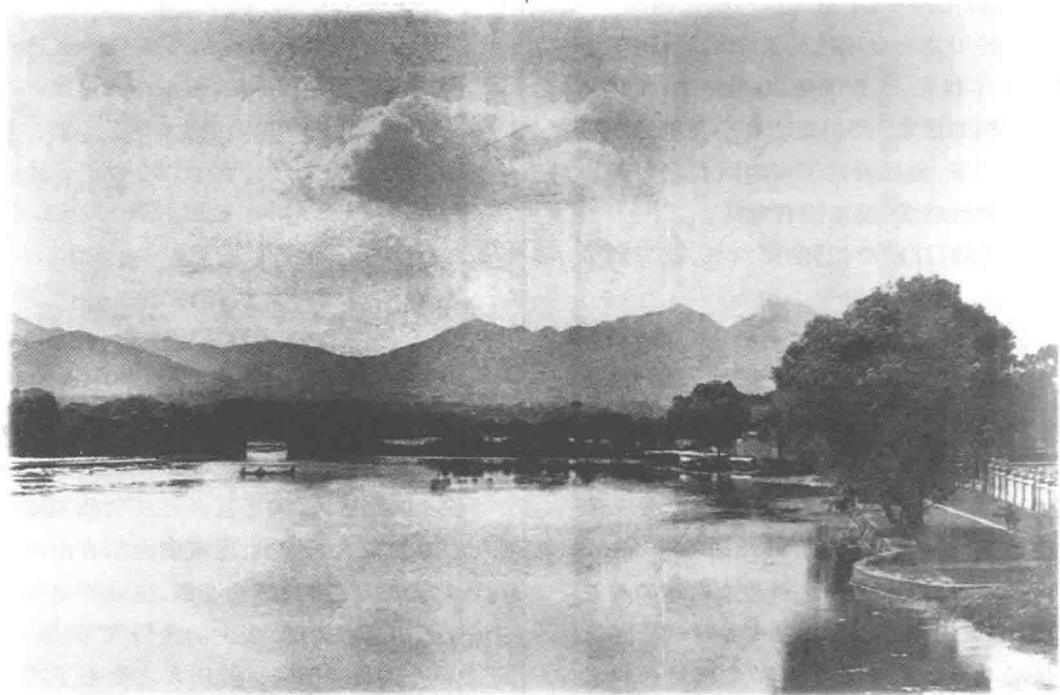
从俞楼出来,芥川龙之介去了苏小小的墓。他用笔绘下了当时的苏小小墓:

现在去了一看，这位唐代美人的墓，原来是铺着瓦顶抹了灰泥的毫无诗意的一个土馒头。特别是墓的附近因为建造西泠桥，墓被弄得极其荒凉，所以更增加了凄凉之感。

在《江南游记》第七节的记述里，芥川龙之介对当时西湖景象，表示了一些不满：西湖水太浅，“西湖的自然风貌就像嘉庆、道光时代许多诗人一样，纤细的感情多得过了头。西湖……成为怯于春寒的中国美人”。更重要的是，“……这个中国

美人已经被湖岸随处所建的、红灰两色俗不可耐的砖木结构建筑物造成致命的而且已经濒于垂危的病根”。芥川龙之介的这个不满，令我想起中国教育家陶行知与芥川龙之介前后写的一封公开信《西湖的危机》。陶行知在这封信里主要谈论的是西湖的保护问题。其中谈到了与芥川龙之介不谋而合的一个意见：“凡不合美术的调和观念的就是俗”，西湖里红顶装烟囪的洋房是最俗的一例了。

当然，芥川龙之介也表示：“我说西湖



西湖群山(摄于1921年前)

不好也并不是全部不好!”他眼中的好的西湖,正像他描绘的:

画舫钻进了跨虹桥,走过了也属于西湖十景之一的曲院风荷附近一带。这一带看不到砖瓦建筑,白墙围着的柳树之中还有迟开的桃花。左边看得见苏堤,那林荫里长着青苔的玉带桥静静地映在水面,也许接近南国的画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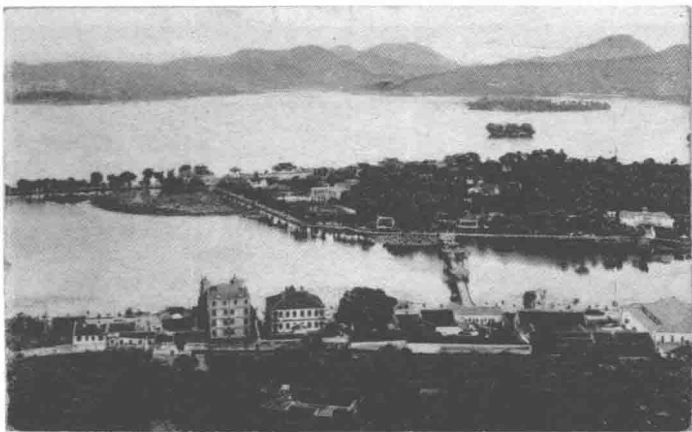
在《江南游记》第八节,写了岳王庙之游,第九节写了在孤山东岸“槐树和梧桐的树荫里”的楼外楼饭馆用餐时的所见风光:

我们的饭桌就在枝丫交叉的槐树之下,再往前一点脚下就是波光粼粼的西湖之水。那水无休止地晃荡,挤进岸壁的石缝发出的声音也显得柔和。水边有三个穿蓝衣服的中国人,一个人在洗拔了毛的鸡,一个人洗旧衣服,另一个人在离他俩稍远些的柳树下,悠闲自得地拿着他的钓竿。只见他突然扬起钓竿,一条鲫鱼在空中乱跳。这种光景在春光之

中给人以十分闲适的感觉。而且,眼前的西湖是那么缥缈,那么辽阔。我确实在这瞬之间忘却了红砖……面对眼前的和平景色,有了小说中描写的那种心情。——石碣村的柳梢沐浴着晚春的日影。阮小二坐在柳树根处,一直心无旁骛地钓鱼。阮小五洗完鸡就进屋取菜刀。那位“鬓插石榴花,胸前嵌刺着青豹”的可爱的阮小七还在洗他那件旧褂子。这时走到我们跟前来的——

“一个挎着大竹篮卖散装零售粗点心的”到来的叫卖,中止了芥川龙之介的想象。芥川龙之介的这个想象,固然表明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的兴趣,然而《水浒传》里的这个场景,恐怕是不能用来类比西湖的吧。至少在《水浒传》里,这个场景的背后是阮氏三兄弟一家生活的拮据,

潜藏着“危机”,是下一幕暴动场景的伏笔。智多星吴用的到来,是要烧起阮家三兄弟的造反之火。所以,芥川龙之介的这个想象至少仅是看到了表面的相同,而忽视了根本上的



西湖全景图(摄于1930年前)

区别。或者说,芥川龙之介喜欢中国江南水乡生活场景,他唯美地看取了其中他所认同的乡村趣味,而轻轻忽略了他所不愿见到的其他的物事。

《江南游记》的第十节,记录了他所见到的雷峰塔:

绕过小岛的尖角,从远离湖水的嫩绿湖岸上,看得见雷峰塔突兀的身影。走到跟前仰视的感觉仿佛站在花园旁边,数不出十二层的多少层。不仅塔的红砖墙上爬满了常春藤,而且塔顶上还长出了杂树,日光一照迷迷蒙蒙,像个幻影一般高高耸立,的确够雄伟。红砖修塔也未尝不可……

这是一幅用文字绘成的彩色的湖上雷峰塔写生稿。

接下来的第十一节,芥川龙之介描述了从新新旅馆楼上所见到的景致:

西湖现在对我们展示了东岸一带。从新新旅馆楼上看,对面已经披上绿装的石山,据说就是以葛洪炼丹之地而著名的葛岭。葛岭顶上有一座庙,像

个正要起飞的小鸟一样,它那屋檐和瓦全是向上翘的。它右边和它相连的山,据西湖全图上说,在宝石山可以看到豪华的保俶塔。这塔身高耸而塔顶尖尖的样子,和形同老衲的雷峰塔相比,也许正如古人所说,简直就是一个美人。然而葛岭是阴天,宝石山顶的草却享受着充足的阳光……连接群山山坡那条白线,一定是今天早晨走过的白堤。白堤左边尽头处,尽管看不见楼外楼的招牌旗幡,但是,一片嫩绿的孤山却横亘在眼前。这样的景色的确很美,这一点是谁也无法否认的。特别是现在菱叶覆盖的水面,掩饰了水底之浅并映出了暗的银色。

是的,当日的西湖固然有不是之处,但西湖到底还是属于天下佳山水,她的美还是掩藏不住的,文艺家芥川龙之介有发现和欣赏美的眼睛,他看到了西湖的动人

之处,他用笔记
录了这美,并且
由衷地承认:
“这样的景色的
确很美,这一点
是谁也无法否
认的。”

在接下来的
几节里,芥川
龙之介描写了
西湖周边的山



宝石山(摄于1930年前)